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# 文史通義全譯

[清]章學誠 原著 嚴杰 武秀成 譯注

上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丛书题签 启 功  
责任编辑 赵 泓  
封面设计 石俊生  
版式设计 赵玄渊

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承印厂质检科,保证调换。

邮政编码:550004

通信地址: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

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

电 话:(0851)6828993

### 文史通义全译

[清]章学诚 原著 严 杰 武秀成 译注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0.625 印张 106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---

ISBN 7-221-03938-0/K·337(平) (全二册)定价:42.80 元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# 文史通义全译

〔清〕章学诚 原著 严杰 武秀成 译注

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1 年~1995 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 
本丛书荣获中宣部 1993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



# 中国历代名著全

-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. 周易全译    | 14. 水经注全译     |
| 2. 今古文尚书全译 | 15. 大唐西域记全译   |
| 3. 诗经全译    | 16. 徐霞客游记全译   |
| 4. 左传全译    | 17. 史通全译      |
| 5. 四书全译    | 18. 文苑英华全译    |
| 6. 资治通鉴全译  | 19. 荀子全译      |
| 7. 围猎全译    | 20. 新序全译·说苑全译 |
| 8. 战国策全译   | 21. 孙子全译      |
| 9. 贞观政要全译  | 22. 论衡全译      |
| 10. 晏子春秋全译 | 23. 尉繚子全译     |
| 11. 吴越春秋全译 | 24. 管子全译      |
| 12. 越绝书全译  | 25. 商君书全译     |
| 13. 廉才子传全译 | 26. 韩非子全译     |

## 译丛书书目 (50 种)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27. 晏子春秋        | 39. 老子全译     |
| 28. 吕氏春秋全译·慎子全译 | 40. 列子全译     |
| ·公孙龙子全译         | 41. 庄子全译     |
| 29. 吕氏春秋全译      | 42. 楚辞全译     |
| 30. 淮南子全译       | 43. 陶渊明集全译   |
| 31. 抱朴子全译       | 44. 文选全译     |
| 32. 颜氏家训全译      | 45.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|
| 33. 世说新语全译      | 46. 唐诗三百首全译  |
| 34. 世说新语全译      | 47. 宋词三百首全译  |
| 35. 世说新语全译      | 48. 文心雕龙全译   |
| 36. 山海经全译       | 49. 诗品全译     |
| 37. 搜神记全译       | 50. 花间集全译    |
| 38. 搜神记全译       |              |

#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## 编 委 会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 (常务)

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

---

## 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,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,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,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,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,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,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,由于时代的变异,语言的古奥,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,我们在全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,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之宗旨,化艰深为浅显,熔译注于一炉,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,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(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),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,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巨著,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;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,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,我们对经部、子部之书选取较多;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,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;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,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，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---

## 前 言

《文史通义》是清乾隆、嘉庆时期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，综论文史，见识卓越，与唐代刘知幾的《史通》相媲美。

章学诚字实斋，号少岩，浙江会稽（今浙江绍兴市）人。生于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卒于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年六十四。其父章铤，字骧衙，乾隆七年中进士，此后在家乡教书多年，直到乾隆十六年才出任湖北应城知县。在任内以疑狱失轻免官，贫困不能归乡，侨居应城，曾主讲应城、天门两县的书院。乾隆三十三年卒。

章学诚十四岁时，随父往应城。他少时多病，读书也迟钝，但对史学很有兴趣，并逐渐形成独到的见解。乾隆二十五年，他离家赴北京应顺天乡试，未中。乾隆二十七年，又应顺天乡试，仍未中。当年冬天，他入国子监读书，因不专力“举业”，考试成绩常列最末几名，被人轻视。

乾隆二十八年夏天，他请假回湖北省亲，当时其父正主讲天门县书院。次年，其父主修天门县志，他代父作《修志十议》及县志中若干篇序文，在此之前，又有《答甄秀才论修志》二书。在这一系列文章中，他的方志学基本观点已经提出。

乾隆三十年，章学诚回到北京，仍在国子监学习。这年又应顺天乡试，同考官沈业富推荐他的文章，但未被录取。于是沈业富请他到家中教书。不久，他从翰林院编修朱筠学古文，深得朱筠赏识。乾隆三十三年，他应顺天乡试，仅中副榜。这年冬天，其

父卒于应城。从此他担起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，家境贫困，但研究学问的志向不改。

乾隆三十六年冬，朱筠出任安徽学政，章学诚随同前往，同行者中有邵晋涵，从此两人成为史学知己。也就在这时，章学诚有了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计划，并开始着手进行。乾隆三十八年，他应和州知州之聘，编《和州志》，次年成书。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修志，从中运用了他自己的方志理论。乾隆四十年，章学诚还京，常与当代学者交游。次年，援例授国子监典籍。乾隆四十二年，他应友人周震荣之聘，主修《永清县志》。这年秋天，入京应顺天乡试，成举人。次年中进士，时已四十一岁。他自以为不合时俗，不愿作官，仍返永清，继续修县志，于乾隆四十四年修成。这年，他的重要著作《校雠通义》完成，共四卷。《校雠通义》代表着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，其中有许多重要见解与《文史通义》相发明。两年后在旅途中遇盗，平生撰著手稿尽失，《校雠通义》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，第四卷竟不可复得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，朱筠卒，章学诚失去依靠，此后生活极不安定，到处奔波，先后主讲肥乡清漳书院、永平敬胜书院、保定莲池书院，以此维持全家生计。但他仍能撰著不辍。

乾隆五十二年冬，章学诚往开封见河南巡抚毕沅，很受器重。次年，往河南归德府主讲文正书院。经毕沅同意，于开封开局编纂《史籍考》，由章学诚主持其事。不久，毕沅调任湖广总督，他只得移家安徽亳州。乾隆五十四年春夏，游太平，在安徽学使署中教书。讲课之余，完成《文史通义》中《原道》等重要文章多篇。这年冬到次年春，为亳州知州修《亳州志》。乾隆五十五年春，章学诚往武昌依毕沅，直到乾隆五十九年秋毕沅降山东巡抚后，他离开湖北回乡。在武昌五年，他继续编纂《史籍考》，还为毕沅主修《湖北通志》，并参与毕沅主编的《续资治通鉴》的编撰，此外还编修了《常德府志》、《荆州府志》。《湖北通志》是章学诚的方

志代表作，但毕沅离开后被废弃不用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，章学诚回乡后，曾出游江苏、安徽。为了完成宏大的《史籍考》，他多方请托，终于得以借浙江巡抚谢启昆之力，于嘉庆元年在杭州继续纂修，成三百二十五卷，稿竟不传。嘉庆五年，他眼睛失明，仍口授著作。嘉庆六年十一月，章学诚病卒。

自乾隆三十六、七年起，章学诚开始撰写《文史通义》。但由于生活不安定，未能集中精力写作，直到他逝世尚未完成。在他去世前几年的嘉庆元年，他曾编过一个选刻本，但不欲广为流传，他说：“拙撰《文史通义》，中间议论开辟，实有不得已而发挥，……然恐惊世骇俗，为不知己者诟厉，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，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与汪龙庄书》）至于全书的篇目，他未及最后确定。临终前不久，他将全部文稿托付友人王宗炎校定。王宗炎拟分为内、外篇，内篇包括《文史通义》、方志略例、《校雠通义》、《史籍考》叙录，外篇录铭志叙记之文，附以《湖北通志》传稿。对于这样的编排，章学诚本人的意见已不得而知。王宗炎不久也去世，章学诚的著作未及刊刻。直到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才由次子章华绂在开封刻印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五卷、外篇三卷，《校雠通义》三卷。章华绂在序中说：王宗炎所编订的目录，“查阅所遗尚多，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，自应更正，以复旧观。”这个本子称作大梁本。清末的多种刻本都出自大梁本。1922年，吴兴刘氏嘉业堂依据王宗炎所定目录与稿本，改编增补，刊印《章氏遗书》五十卷，使章学诚的著作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于世。《章氏遗书》包括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卷、外篇三卷。于是《文史通义》有了另一种版本。

目前流行的《文史通义》版本，主要是大梁本与《章氏遗书》本两个系统。两种版本的内篇稍有差异，外篇则全然不同。内

篇的不同之处是，大梁本分五卷，《章氏遗书》本分六卷，篇目次序不尽相同，《章氏遗书》本多出《礼教》等八篇，而少《妇学篇书后》一篇。外篇虽然都是三卷，但大梁本是论述方志的文章，《章氏遗书》本是驳议序跋书说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两种版本的外篇的内容，章学诚自己都看作是《文史通义》的内容。例如，他曾说《亳州志》“义例之精”，是“《文史通义》中之最上乘也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又与永清论文》），也曾说“《郎通议墓志书后》，则《通义》之外篇也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与邵二云论文书》）。因此，两种版本都不能说完全符合章氏的原意。比较而言，方志学理论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把方志论文排除在外是很不妥当的。因此，可以说大梁本稍胜于《章氏遗书》本。

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。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，也是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。章学诚不满当时脱离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，意欲持世救偏，这就是《文史通义》的主要写作目的。他说过：“学诚从事于文史校讎，盖将有所发明。……惟世俗风尚，必有所偏。达人显贵之所主持，聪明才隽之所奔赴，其中流弊必不在小。载笔之士不思救挽，无为贵著述矣。苟欲有所救挽，则必逆于时趋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九《上辛楣宫詹书》）当时人常把文化思想界分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途，他概括各家之弊：“骛于博者（指考据家），终身弊精劳神以徇之，不思博之何所取也。”“擅于文者，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，不思文之何所用也。”“言义理者，似能思矣，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，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”他从而指出：“天下不能无风气，风气不能无循环。……所贵君子之学术，为能持世而救偏。”（《原学下》）又说：“学业者，所以辟风气也。风气未开，学业有以开之。风气既弊，学业有以挽之。”（《天喻》）由于与当时风气不合，章学诚一生落落寡合，学说未能广泛流传。但自从清末起，他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“六经皆史”说是章学诚最著名的论点，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。在章学诚之前，学者已有类似的说法，但他赋予这一命题以新意，使之系统化，因此可以说“六经皆史”说是他的创见。他说：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。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（《易教上》）又说：“古之所谓经，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。”（《经解上》）这就是说，六经不是空言，而是先王的政典，是治理天下、切合社会生活的实迹。因此六经是史。后人视六经为载道之书，但六经之“道”并不脱离社会事实这“器”，因此六经的重要意义在于经世致用。经世致用，实际上是“六经皆史”说的目的。

经世致用，是清初浙东学派的主张。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开山祖师，擅长史学，治史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联系社会实际。自黄宗羲到万斯同，再到全祖望，一脉相承。章学诚作《浙东学术》篇，隐约自列于浙东学派。他说：“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为卓也。”“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六经，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著述者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，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”他继承了浙东学派的传统，提倡经世致用，所以他对汉学家“舍今而求古”的烦琐考据和宋学家的“舍人事而言性天”的空谈都加以有力的抨击。

与“六经皆史”说相关连的有“言公”说。“言公”的主旨是：“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。”（《言公上》）“言公”说的依据是古代治教合一，官师不分，事理无殊，道器不离。章学诚说：“三代以前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未尝不以教人。……盖以学者所习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国家政教，而其为用，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，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尝别见所藏之道也。自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，亦谓先王先圣之道不可见，求

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为说，以致离器言道也。”（《原道中》）又说：“盖自官师治教分，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，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，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。……学者崇奉六经，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，不知三代盛时，各守专官之掌故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。”（《史释》）六经皆史，学术在官，二者实则浑然一体。

《文史通义》的重大贡献是在史学理论上，主要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：强调史学家具有“史意”、“史德”的重要性，辨明史料排比和史著的区别，主张扩大史料范围和改革史书体裁。

强调“史意”、“史德”，是章学诚的创见。刘知幾曾指出史学家要有“史才”、“史学”、“史识”三长，人们将章学诚比拟刘知幾，他说：“刘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；刘议馆局纂修，吾议一家著述；截然两途，不相入也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家书》二），他又曾说：“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，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，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，此余《文史通义》之所为作也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外编卷十六《和州志志隅·自序》）章学诚认为刘知幾不知“史意”，知“史意”才可以成一家著述。“史意”，章学诚又常称“史义”。什么是“史意”呢？“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义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”（《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》）那么“史意”与刘知幾所说的“史识”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大体上说来，“史识”是就历史编纂方法而言，指对史实的判断能力，所以章学诚说“刘言史法”。“史意”是指史学家的历史观、作史主旨，与史事、文辞相关，起指导作用。他说：“史所贵者义也，而所具者事也，所凭者文也。”（《史德》）“载笔之士，有志《春秋》之业，固将惟义之求，其事与文，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。”（《言公上》）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孔子说，《春秋》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”。章学诚提出“史意”，实际是从这里得到启发。他有这

样的阐述：“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，不仅事具始末，文成规矩已也。以夫子‘义则窃取’之旨观之，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，所以通古今之变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详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后微茫杪忽之际，有以独断于一心。及其书之成也，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，契前修而俟后圣，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。”（《答客问上》）可见他提倡“史意”，是希望史学家探求历史规律，成一家之言。

章学诚提出“史德”，也是对刘知幾史学“三长”的补充，他专门写了《史德》篇加以论述。他说：“刘氏之所谓才、学、识，犹未足以尽其理也。”“能具史识者，必知史德。德者何？谓著书者之心术也。”刘知幾曾说过：三长之外，“犹须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”（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）。这涉及著史者的品德。但章学诚所说的“史德”或“心术”，指“慎辨于天人之际，尽其天而不益以人。”“天”，指客观事实；“人”，指著书者的主观意图。他的要求是，史学家应当慎重辨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，尊重客观事实，而不加进主观成分。他提出“史德”，是因为看出历来提倡的“直笔”还不能完全解决如实反映史实的问题。他认为，人有情感，看待史事会有情感变化，以至于“似公而实逞于私，似天而实蔽于人，发为文辞，至于害义而违道，其人犹不自知也。”因此他指出要注重平日学养，节制个人的“气”与“情”，使“气合于理”，“情本于性”，尽量做到“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”。

章学诚极清晰地辨明了史料排比和史学著述的区别。传统的史学分类法只从体裁上着眼，分为纪传体、编年体等，章学诚则从性质上着眼，划分为两大类，即记注和撰述，或称比类和著述。记注或比类，指史料排比；撰述或著述，指熔铸史料而成的著作。关于这种区别，刘知幾曾有初步的认识：“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

简。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”（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）南宋郑樵也有类似认识。但只是到了章学诚才彻底弄清这区别。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何在呢？他说：“《易》曰：‘蓍之德圆而神，卦之德方以智。’闲尝窃取其义，以概古今之载籍，撰述欲其圆而神，记注欲其方以智也。夫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，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，故记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，而其德为方；知来欲其决择去取，故例不拘常，而其德为圆。”（《书教下》）这是说记注遵守一定体例，完备无遗；撰述融会贯通，不必谨守绳墨。他还作出形象的比喻：“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，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报黄大俞先生》）针对当时以考订为学的风气，他更重视撰述。

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说，在经世致用的目的之外，还有另一意义，即扩大史料范围。他更进一步说：“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。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子、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本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报孙渊如书》）在拟订《史籍考》采集书目范围时，他提出“经部宜通”，“子部宜择”，“集部宜裁”，“方志宜选”，“谱牒宜略”。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）综观他的论著，他所说的史料包括儒家经典、私家著作、州县志书、官府案牍，金石图谱、民间谣谚等。

章学诚提出了对史书体裁进行改革的意见。南宋袁枢依据《资治通鉴》，作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开创了纪事本末体。章学诚很推崇纪事本末体。他说：“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，非深知古今大体，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，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”（《书教下》）他主张就纪传体加以改革，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，使其趋于完备。新的体裁应大致由三部分组成：一、本